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  
研究所周刊  
全編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周刊全編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全編 /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13 - 4015 - 6

I. ①國… II. ①國 III. ①語言學史—叢刊—中國—民國 IV. ①H0 - 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85105 號

責任編輯: 于春媚

ISBN 978-7-5013-4015-6



書名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全編(全八冊)

著者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325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015 - 6

定價 4500.00 圓

#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編纂出版委員會

主 任：周和平

常務副主任：詹福瑞

副 主 任：陳 力 張志清

委 員(按姓氏筆劃)：

王 志 庚 方 自 金 李 健

李 曉 明 汪 東 波 林 世 田

徐 蜀 殷 夢 霞 郭 又 陵

陳 紅 彥 蘇 品 紅 顧 犇

# 總序

詹福瑞

民國時期，中國處在從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蛻變的一個重要階段。這個時期，政治風雲變幻，思想文化激蕩，內憂外患疊起。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新與舊、中與西、自由與專制、激進與保守、發展與停滯、侵略與反侵略，各種社會潮流在此期間匯聚碰撞，形成了變化萬千的特殊歷史景觀。僅從文化角度考察，一方面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整理繼承和批判揚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強烈地衝擊和影響着當時人們的思想與行爲。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翻譯介紹與傳播，不僅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且直接導致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爆發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巨變。

當此之時，社會政治雖然動蕩不已、經濟脆弱不堪，思想文化卻大放異彩。知識界思維活躍，視野開闊，著述興盛，流派紛呈。加之出版業和新聞業的飛速發展，使民國的出版發行達到空前的規模。短短的數十年間，積累了包括圖書、期刊、報紙以及檔案、日記、手稿、票據、傳單、海報、圖片及聲像資料等等大量文獻。這些文獻作爲此一時期思想文化的特殊載體和社會巨變的原始記錄，不僅數量巨大，可稱海量，蘊涵其間的思想文化價值更不在歷來爲人們所珍視的善本古籍之下。

作爲一個剛剛過去的歷史時期，民國距今時間最近，與當前的現實關聯也最爲密切。因此，對民國歷史的研究向來爲各界所重視。經過近六十年的努

力,特別是經過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有關民國史的研究著述和史料大量出版,學術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學術交流活動日漸頻繁。目前,民國史研究已經成爲中國歷史研究諸學科中建立較晚,卻發展較爲迅速、取得成就較爲顯著的學科,並有逐漸成爲國際“顯學”的趨勢。

與學術研究相適應,在既往的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民國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與出版工作,也有很大的推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利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民國各級政府檔案整理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根據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整理出版的《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根據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檔案整理出版的《滿鐵密檔》,利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圖書整理出版的《民國叢書》,以及湖北所編辛亥革命史料,天津所編北洋軍閥史料,西南各省所編西南軍閥史料,廣東所編孫中山及南方政府史料,東北所編“九一八”和偽滿史料,上海所編汪偽史料及民族資本企業經濟史料,重慶所編國共關係史料,包括以《國民政府公報》爲代表的民國政府出版物,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爲代表的民國報紙,以《東方雜誌》、《良友雜誌》爲代表的民國雜誌等等的整理出版,都是這方面工作的重要成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臺灣地區也影印出版了以《革命文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爲代表的大批民國文獻,爲人們瞭解民國社會與歷史,從事學術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

然而,這些整理和出版工作,與民國史研究日新月異的發展以及社會各界對民國文獻資料巨大的使用需求相比,還存在着很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說,目前民國文獻的傳藏與利用正面臨非常嚴峻的危機。相關調查顯示,由於近代造紙、印刷、裝訂等工藝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先天不足以及各收藏機構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觀念滯後、認識不足、經費短缺、保管不善等原因所帶來的後天損

害,使得國家圖書館、歷史較為悠久的公共圖書館以及為數衆多的高校圖書館、科研機構圖書館、檔案館、海外公私藏書機構收藏的民國文獻,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嚴重的老化或損毀現象。以國家圖書館為例,館藏約六十七萬冊民國時期文獻中,達到中度以上破損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民國初年的文獻更是百分之百地破損。研究表明,民國文獻的保存壽命一般為五十至二百年。也就是說,時光流轉到今天,相當一部分的民國文獻已處於行將消失的危急狀態!文獻本身面臨湮滅消亡,亟待搶救和保護,當然也就談不上服務社會,服務學術,滿足各界查閱使用的需求。

針對此等危機,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衆多專家學者多次發出呼籲,號召全社會都來關注民國文獻的“生存現狀”,重視民國文獻的搶救保護與開發利用。以國家圖書館為首的衆多公共圖書館、高校及科研機構圖書館、檔案館,更積極從原生性保護和再生性保護兩個方面,採取了改善保存環境、強化修復手段和加速縮微複製等一系列切實有效的保護搶救措施,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與更大範圍的老化和損毀現象相比,與保護經費和專業修復人才嚴重短缺、修復手段相對滯後的尷尬、危急狀況相比,這些保護和搶救措施,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國文獻保護傳藏與開發利用所面臨的諸多困難。

從總體的形勢看,及時搶救保護數量宏富的民國文獻,避免我國悠久的文獻傳承歷史出現令人痛心的斷層,切實保障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延續與光大,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這決非危言聳聽。

作為國家總書庫、處於文獻保存保護龍頭地位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備感形勢的嚴峻與責任的重大,經過反復考察論證,在吸收國內外圖書文獻保存保護先進經驗,並對館藏民國文獻進行全面調查摸底的基礎上,決定在繼續推進既有各項搶救保護措施的同時,率先成立“中國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資料編纂出版委員會”,依據館藏特色、資料類型、瀕危狀況、珍稀程度和社會需求等,進行分類整理,並以“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的形式,有計劃、有步驟、成規模地陸續

編纂出版。決心持續投入大力，通過這種已為成功實踐所證明的、切實有效的再生性保護手段，在及時搶救保護文獻的同時，也使之化身千百，為社會和學界提供更為便利的文化學術服務。相信這項工作的科學有序開展及這套叢書的陸續編纂出版，必將對文獻的保護、文化的傳承、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復興有較大的貢獻。

是為序。

二〇〇八年一月



# 顧頡剛先生在中山大學

(代前言)

王煦華

## 一、顧先生是怎樣到中大的

顧頡剛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到中山大學任教，是由顧孟余推薦，傅斯年發函邀請的。當時顧孟余為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傅斯年任文學院長。傅為顧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的同窗好友。此事在顧先生三月一日的日記中有以下的記載：

孟真來了兩封快信，要我到廣東中山大學辦中國東方語言歷史科學研究所。

其後，顧孟余也寫信給顧先生，要他去中山大學，三月十五日的日記說：

昨得孟余先生書，謂武昌中山大學經費設備俱感缺乏，囑到廣州中山大學。

按二月二日的日記有武昌中大見聘的記載，三月六日的日記上又說：“武昌中山大學來電促行，署名為戴夏，邀予及語堂、魯迅兩先生。”故顧孟余的信中說武昌中山大學的窘況，以吸引顧先生去廣州。顧孟余的推薦，顧先生是事後知道的，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上說：

莘田（羅常培）述川島（章廷謙）之言曰：“頡剛……由孟余推薦至廣州。……”

一九五〇年，顧先生寫的《自傳》（《東方文化》1994年第4期）又說請他去中大的還有朱家驊。他說：

國民革命時，他（朱家驊）任中山大學的委員，主張請我去也有他的成份。顧先生遂於三月二十二日，向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辭職，為怕校長挽留，他先將辭職信交《民鐘報》發表，而後到校長家辭職。此日的日記說：

今日到校長處辭職，恐為挽留，先到《民鐘報》，將辭函面致，囑其付印。

而後到校長家，遂辭去矣。

此後，顧先生即準備去粵。於四月十五日乘輪離開廈門，十七日到廣州。

## 二、為中大圖書館收購圖書

顧先生到中山大學後，與魯迅等發生矛盾，當時的中山大學副校長朱家驊作出調處辦法：一方面允許魯迅等請假離校；一方面派顧先生到江、浙一帶為校中圖書館購書。為此，顧先生於四月底開始作《國立廣州中山大學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至五月中旬改畢。顧先生的這個購求圖書計劃書是有開創性的。他提出收集中國書籍應該破除“聖道”和“古文”的傳統觀念，打破以“經、史、子、集”為書籍全體的看法，樹立“搜集材料”的購書宗旨，“把記載自然界和社會的材料一齊收來”，“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識，專家們也可以致力於研究”，把圖書館辦成“供給許多材料來解決現代發生的各種問題的”機構。又說“我們要以新觀點所支配之材料搜集，成就研究本國各問題之科學化，既以助成新材料之基礎建設，並使我們的圖書館成為一個有生命的圖書館”。五月十四日，顧先生在圖書館學術研究會宴席上，講述了這個購書計劃。後來列入《中山大學圖書館叢書》之一，印了出來。

顧先生的計劃書中要收集的圖書，有以下十六類：1. 經史子集及叢書；2. 檔案；3. 地方志；4. 家族志；5. 社會事件之記載；6. 個人生活之記載；7. 賬簿；8. 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9. 基督教出版之書籍及譯本書；10. 宗教及迷信書；11. 民眾文學書；12. 舊藝術書；13. 教育書；14. 古存簡籍；15. 著述稿本；16. 實物的圖像。他對每類的內容及收集的必要性都作了說明。當時中山大學的圖書館館長為杜定友，對這個計劃書推崇備至。他在此書的《書後》中說：顧先生“擬的十六大類，已經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盡，更不容有所添減”。“我們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為購書根據；而且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在中國圖書學上發生重大影響，以助中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顧先生的族叔顧廷龍先生一輩子從事圖書館工作，歷任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訪主任、上海合眾圖書館總幹事、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館長等職，數十年來實踐了顧先生的“搜集材料”的購書宗旨，他在《介紹顧頡剛先生撰〈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中說：“我從事圖書館古籍採購事將五十年，即循此途徑為收購目標，頗得文史學者的稱便。”（《文獻》第8輯）此外，上海圖書館之所以能在原合眾圖書館搜集的基礎上陸續編成《中國叢書綜錄》、《中國近代期刊篇名匯錄》、《朱卷集成》等書出版，飲水思源，都是在顧先生“搜集材料”的購書宗旨的影響下，經過數十年來不斷的有目的的搜集，使材料積累成一定的系統而成功的。杜定友先生所希望的“這本小書能夠在中國圖書學上發生重大影響，以助中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實現。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顧先生的購書宗旨

會產生更為重大的影響。這些話扯得遠了一些，但由於重視材料的搜集積累，加以整理、分類排比，使之系統化，是體現顧先生治學特色之一，所以多說了幾句。現在回過頭來談顧先生購書的事情。

顧先生於五月十七日乘船離粵，二十二日到達上海，以後即在滬、杭一帶購書，前後歷時四個月，共收得圖書約十二萬冊，碑帖約三萬餘張。整個收購情況，見顧先生寫的《本館舊書整理部年報專號卷頭語》（《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第6卷第1至4合期），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購書結束後，顧先生即於九月二十六日離開杭州到上海，十月九日乘輪船返粵，十月十三日抵廣州。

### 三、創辦三個周刊及倡導民俗學運動

顧先生返校後，任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兼主任，後來又兼語言歷史學所主任和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十月十六日在傅斯年處開會商量出版刊物，他的日記中有以下記載：

今日議定刊物四種：

- (1) 文史叢刊 由文科主任及各系主任編之。（華按：此刊未出版。）
- (2)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 余永梁、羅常培、商承祚、顧頡剛等編。
- (3) 歌謠周刊 鍾敬文、董作賓編。
- (4) 圖書館周刊 楊振聲、顧頡剛、杜定友編。

半個月後《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於十一月一日創刊，《發刊詞》是顧先生寫的，他高瞻遠矚地提出要認清時代，重視材料的搜集整理，用新的方法研究，達到現代的學術水平。他說：

我們生在此際，應該永遠想著：這個時代是一個怎麼樣的時代？我們研究的學問有怎麼大的範圍？我們向那裏尋材料？我們整理學問的材料應當用怎樣的方法？能夠這樣，我們自然可以在前人的工作之外開出無數條的新道路，不至拘守前法，不能進步。

……我們要打破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學術界的一切成見！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至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我們要使中國的語言學者和歷史學者的造詣達到現代學術界的水平線上，和全世界的學者通力合作！這一種刊物是達到我們希望的先導……

這個刊物出到一九三〇年停刊，在當時語言學和歷史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確實起到了先導的作用，開創了廣東學術界的新風氣。

原來議定出版的《歌謠周刊》，改名為《民間文藝》也在同時出版。十一月，顧先生與鍾敬文、容肇祖等發起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內成立民俗學會。他“主張把收到的材料多刊印，使得中山大學收藏的材料成為學術界中公有的材料……這些初露的材料靠了印刷的傳佈是不會滅亡的了；這些種子散播出去，將來也許成為長林豐草呢”。（《閩歌甲集序》）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他“與思敬談民俗學刊”（日記），三月又將《民間文藝》改名為《民俗》，於三月二十一日出版，顧先生寫的《發刊辭》，強調要重視“農夫、工匠、商販、兵卒、婦女、遊俠、優伶、娼妓、僕婢、墮民、罪犯、小孩”的生活。並高聲呼喊：

我們要站在民眾的立場上來認識民眾！

我們要探檢各種民眾的生活，民眾的欲求，來認識整個的社會！

我們自己就是民眾，應該各各體驗自己的生活！

我們要把幾千年埋沒著的民眾藝術、民眾信仰、民眾習慣，一層一層地發掘出來！

我們要打破以聖賢為中心的歷史，建設全民眾的歷史！

王文寶在《中國民俗學發展史》中對這篇《發刊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了極高的評價，說這篇“作為中國第一個正式的民俗學會組織刊物的《發刊辭》，是“我國民俗學運動的一篇宣言書和動員令”。魏建功在《〈歌謠〉四十年》（《民間文學》1962年第2期）一文中說：

顧先生就是民俗研究的開路人。對《歌謠》說，顧先生苦心孤詣做了分蘖移植的辛勤勞動。他把從歌謠到民俗的調查整理研究工作，自北而南，由北京帶到廣州。中山大學出的《民俗》雜誌，便是《歌謠》中斷時期，他大力提倡在南方生長出來的新苗。

同時，顧先生還設置風俗物品陳列室，把收集到的實物公之於眾。顧先生主編的《民俗學會叢書》，初名《民俗學會小叢書》，他為這套叢書寫了《弁言》，後改名《民俗學會叢書》，有的書上又名《民俗叢書》，有時在叢書名的前面又冠上“國立中山大學”或“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等名稱，叢書名在每一種書上沒有固定的地方，又不明顯，開本也大小不一，更沒有一個總目，所以這套叢書究竟出了多少種就不大容易弄清楚，就我所知所見，陸續出了三十餘種。顧先生自己編著的《蘇粵的婚喪》、《妙峰山》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等也收入這部叢書中。他還為其中的《廣州兒歌甲集》、《民俗學問題格》、《蘇州風俗》、《閩歌甲集》、《謎史》、《廣州謎語》、《湖南唱本提要》、《福州歌謠甲集》、《泉州民間傳說》、《妙峰山瑣記》等十種書寫了序。顧先生在為劉萬章的《廣州兒歌甲集》作的序中再一次強調印行材料的重要性和作用。他說：

當盡力搜求真正的民間材料，從扮演的戲劇到隨口稱說的故事，從合樂的謳到徒歌的謠，一切收取，使得方言文學永遠保存新生的活氣。……

我們主張出刊物，使得這些材料不但為我們學會的材料而為學術界公有的材料，更希望各地的人看見了我們的工作，都肯把自己在家鄉最感趣味的民間文藝儘量地搜集，編成專冊，寄我們出版。

顧先生的這些話是有感而發的。因為這篇序寫於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間，正是《民俗叢書》出版碰到困難的時刻。

由於二十年代，中國民俗學剛剛創立，人們對它不理解，顧先生出版《民俗叢書》遇到巨大困難，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拼命出”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

民俗學會的《叢書》拼命出。……出到一、二冊時，孟真說這本無聊，那本淺薄。出到三、四冊時，叔儻就請校長成立一個出版審查會來限制[據叔儻說，是緝齋(汪敬熙)勸他如此的]，出到七、八冊時，戴校長就辭掉敬文了。……孟真告我，此次之事乃系戴校長因《吳歌》乙集中有穢褻歌謠，故令孟真辭之。……使敬文蔽我之罪，這算什麼呢？……

在印書上，孟真和我的主張很不同。孟真以為大學出書應當是積年研究的結果。我以為這句話在治世說是對的，在亂世說是不對；在一種學問根基打好的時候說是對的，在初提倡的時候說是不對。……民俗學是剛提倡，這一方面無憑藉，所以我主張有材料就可印。固然又有材料又有研究是最好，但現在時候是何人能做呢？況且有了材料自然能引起人家的研究。(《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第532頁)

關於此事的經過，先是五月十六日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成立出版物審查委員會，開第一次會議，顧先生與容肇祖被推為審查《民俗周刊》稿件負責人，顧先生又與何思敬、黃仲琴被推為審查《民俗叢書》刊印一切事宜，(《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30期)然後“校總出版審查委員會”在復審中加以阻撓限制，顧先生的日記中有以下的記載：

5月22日 孟真見告，謂昨日校中“出版審查委員會開會”，將研究所已審查之書重行審查，叔儻不肯以《民俗叢書》付議決，思敬至有“《民俗叢書》將成顧頤剛叢書”之語。

5月23日 寫朱驪先(朱家驊)信，約二千言，論叔儻阻止出版書籍事，謄兩份，分寄寧、杭。

5月28日 開“研究所出版審查委員會”會。(華按：這次會議通過了一個反對限制《民俗叢書》出版的決議。《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出版物審查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議決事項第一項云：“顧頤剛提議‘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出版物審查委員會’第一次議決案而成立，所有審查責任應由本會完全負責，因此既經本‘研究所出版審查委員會’通過即無庸送交‘總出版物審查委員會’復審，以省手續而分責任，此事由本所函請校長核准施行。”可見這是反對“校總出版物審查委員會”復審限制《民俗叢書》出版的一個決議。）

5月31日 今日騶先先生來兩電，一致予，一致叔儻，允可印書，叔儻因此辭職。

7月4日 敬文為學校所辭，謂是因《吳歌》乙集有穢褻歌謠之故，為戴季陶大不滿意。然此等事由我主持，何不辭我耶！

一九七三年七月，顧先生又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日記的末尾，追述此事經過。他說：

我主編之《民俗叢書》，已在出版會議上為伍叔儻、何思敬等所否決矣，及我致朱家驊函，寧、杭各一通，爭之，朱遂來兩電，一致伍，一致予，而遂復刊。又助予編輯《民俗》周刊之鍾敬文，為戴季陶所開除，亦仗朱之力，得繼續出版。

顧先生爭取《民俗叢書》、《周刊》的繼續出版，由於朱家驊的支持，一場風波，終算化險為夷過去了。《民俗》雖得繼續出版，但鍾敬文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離開了中大，於九月七日去上海。到十月二十日，容肇祖接編《民俗》。顧先生離開中大前一個多月，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由容肇祖主持，召開民俗學會議，顧先生參加了這次會議，議決繼續編印《民俗學會叢書》，故這套叢書在顧先生走後，仍能繼續出版了一個時期。

除了出版《民俗周刊》和《叢書》外，顧先生還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到校長處商量民俗學傳習班事”（日記）。經過不到一個月的籌備，與教育學研究所合辦的民俗學傳習班，於四月二十三日開始上課。顧先生在傳習班講“整理傳說的方法”，他講了三次：一為“《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講故事傳說的演變和整理與方法；二為古代民族宗教，講商、周、秦、楚、燕、漢諸代所崇奉的神祇與古代宗教傳統之源流；三為“《山海經》”，講此書集戰國時人對於世界萬物想像的大成，為研究古代傳說的資料。在傳習班授課的還有何思敬、莊澤宣、汪敬熙、崔載陽、劉奇峰、馬太玄、陳錫襄、容肇祖、余永梁、鍾敬文、楊成志。學員二十余人，傳習班辦了三個月，到七月份結束。

顧先生還組織團體去雲南考察少數民族生活。成員為史祿國（S. M. Shirokogoroff）夫婦、楊成志、容肇祖。顧先生七月十日的日記記此事道：

到南園，為餞別赴滇調查諸君也。

一九七三年七月又追記此事云：

此為我主持中大研究所時，作到組織一團體以考查彝族生活的唯一事件。結果史祿國又出了岔，惟容肇祖、楊成志寫出一冊報告耳。

從上述顧先生編刊物、設置風俗物品陳列室、出叢書、辦傳習班、組團調查少數民族生活等一系列活動來看，可見他在中山大學一年多的時間裏，為開展民俗學研究做了大量的組織、宣傳的工作，有力地推動了南方的民俗學運動。

《圖書館周刊》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議定出版後，顧先生于次日即“到圖書館，計劃一切”。十一月二日，“圖書館委員會開會”，也去“出席”（均據顧先生日記），但由於他忙於講課，編講義，而且自滬、杭所購書籍，尚未整理，所以，他是先理書，後辦刊。一月份，顧先生親自籌劃和參加整理從滬、杭新購的書籍。在他的日記中，有以下記載：

1月4日到圖書館商量事務。

1月5日到校，處置理書事務。圖書館派職員侯晴嵐女士到所，助我理書，更邀文科事務員黎翼墀君襄理，蔣徑三君亦住入所中。

1月6日到校，處置理書事，擬規劃及佈告（理書程序）。佈置辦公室。

1月9日到校，理新購書籍。編目，必於年假內完工。……故此年假中，予之忙反較常日為甚矣。

以後，即每日到校理書，這裏就不一一贅引了。到一月二十日整理告一段落。

二月份，顧先生即籌劃出版《圖書館周刊》，在他的二月十一日的日記裏，有“到定友處，談《圖書周刊》事”的記載，二十日又有“金甫、定友來商《圖書周刊》事”的記載，故《圖書館周刊》到三月份就出版了。顧先生的《清代著述考》，先後與馬太玄、陳槃作了補正後，陸續刊於這個刊物。

總上所述，中大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三個周刊，都是在顧先生主持下創辦的。顧先生為了辦好這三個周刊，費了很多心血，所以辦得很有生氣和特色，在傳播語言學、歷史學、民俗學和圖書館學的學術成果和培養青年學者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可是，這些刊物，在顧先生一九二九年二月離開中大以後，就一個一個地停辦了，這是令人惋惜和值得深思的。

#### 四、擔任的課程及編寫的五種講義

顧先生在中大一年多時間裏，所擔任的課程：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暑假，是“中國上古史”、“《書經》研究”、“書目指南”和“文史導課”。一九二八年九月至次年一月，為“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和“中國上古史實習”。這些課程中，他所擔任的導課，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記有以下記載：

到校參加教務會議及國文、史學兩系會議。……會議結果，予擔任導課如下：史料問題、整理民間傳說方法、中國神祇史、《詩經》、閻若璩、崔東壁、康有為。

後來，這個計劃有了變動。用文史導課名義講的：《詩經》講了三課；中國神祇史講了十一課，講的是《郊祀志》。整理民間傳說方法，則在民俗學傳習班上講了。另外則用了“三百年來思想史”課的名義，講了三個學期：第一學期講了“閻若璩”二課，第二學期講了“崔東壁”六課，“卅年中新發現之學問”三課，第三學期講了康有為二課。“史料問題”，日記上未有開講的記載。他所講的這些導課，都未有講稿留下來，只有最後講的康有為，有魏應麒、石兆棠的筆記，並經顧先生修改過一部份，我把它整理後加上《清代“經今文學”與康有為的變法運動》的題目，發表在《中國文化》一九九〇年第三期上。

顧先生講的其它三種課程，“書經研究”和“中國上古史”，都留下大量的講義，“書目指南”則沒有講義留下來。

顧先生在中大編的《尚書學講義》是在他廈大編的《尚書講義》第一編的基礎上刪改增補的。內容變動很大，他把原來十六篇參考材料刪去六篇，增加五十二篇，共六十二篇。其中十六篇，他寫了案語，除了第一篇案語是在廈大時寫的以外，其它十五篇案語，都是在中大時寫的。中大的“《書經》研究”是一學年的課程，可是，到一九二八年暑假前，顧先生沒有能把講義編完，在他九月份的日記裏，還有下列的記載：

9月3日 作……《尚書講義總目》畢。作《尚書講義提要》，未畢。

9月4日 寫《尚書學講義》分卷目。

9月5日 點《群經平議》講義稿。

9月14日 又審覽《〈群經平議〉中之〈尚書〉解》一篇。

此後，由於新學期開始，他忙於編新開課程的講義，《尚書學講義》就再也沒有編下去了。上述四天的日記，可以解決顧先生留下的原稿和油印本的一些問題。一、現存《尚書學講義》的“提要”，原稿僅到“參考材料之三十”，油印本則一張也沒有，日記既云“未畢”，可見顧先生所寫的“提要”，到此為止，以下是原缺。二、劉起鈺同志在《顧頡剛先生學述》和《尚書學史》兩書中談到這部講義時，都稱為“尚書學參考資料”八巨冊，但這部講義的“總目”和“分卷目”，顧先生都題為《尚書學講義》，“參考材料”則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分卷目”下，他有一個說明：

正文凡一一三篇（華按：指《尚書》二十八篇、《逸周書》六十篇、《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參考材料凡六十二篇，加以附錄，列為十四卷。（第十三卷暫缺。）



可見，這書確切的完整名稱，應是《尚書學講義》，不是《尚書學參考資料》，為免今後訛傳，特加以說明。又所謂“八巨冊”，是指原稿草釘為八冊，至於他自存的油印本則草釘為五冊。三、以原稿與油印本相較，原稿多一“提要”；但原稿缺失很多：“正文”缺《尚書》和《逸周書》；“參考材料”缺第一、三、二十五、四十一、五十三等五篇；“附錄”缺第二學期試題、目錄、勘誤表。為此，我據原稿打印了一份“提要”補入油印本，使顧先生自存的油印本成為內容最多的一部。四、以“總目”、“分卷目”核對原稿和油印本，則原稿和油印本的“附錄”皆缺第一學期試題、研究題目、序文和提要的下半部分。這和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日記上的“《尚書講義》未發者”的記載相符。此外，有一冊鉛印的校勘表。

顧先生在中大編《中國上古史講義》的經過，後來他在燕京大學編的《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自序》中有以下一段簡要的記敘：

民國十六年秋天，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到的時候已開課了，功課表上已排上我的“中國上古史”了，而且選課的人也選定了。這一急真把我急得非同小可：這事當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得不編講義而專印材料，把許多人的零碎文字鈔點出來，約略組成了一個系統。那時所印的材料分作五種：

甲種——上古史的舊系統，以《史記》秦以前的本紀、世家為代表；

乙種——《史記》本紀、世家所根據的材料及其他真實的古史材料（其實這兩類不應合在一起）；

丙種——虛偽的古史材料，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宗教活動的記載；

丁種——古史材料的評論；

戊種——預備建立上古史新系統的研究文字。

顧先生在一年的教學中，搜集了不少的材料，計甲種二十二種，乙種八十九種，丙種十八種，丁種十八種，戊種十一種，共計一百五十八種，其中三十七種作了案語。顧先生的這部講義，也是到九月份才編完的。原稿因後來有的抽作他用，已七零八落，殘缺甚多。他自存的油印本，為綫裝十八冊，尚完整無缺（其中漏釘之甲種之十、十一有零頁可補入，乙種之八十五為原缺）。根據總目核對，油印本附錄存第一學期考試題目、平時成績題目、目錄一種。缺者為：第二學期考試題目、第一次平時成績題目、目錄一種、序文和勘誤表。但第二學期考試題目另有鈔本在，可據以補入。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的日記所載：“上古史講義未發者：乙種八十五，《戰國策》中之士（附《孟子》）、平時成績題目（第二種）、目錄改定本、序文、勘誤表。”與現存的油印本相符，當為原缺。顧先生對試題是很重視的。他在“中國上古史第一學期試題”附告中說：“這份題目紙請帶回和講義釘在一起。”又在“中國上古史課平時成績題目”的前記中說：